

毛泽东用“文房四宝”打垮国民党



国共双方于10月10日正式签署会谈纪要。但谈判只是蒋介石用来拖延时间准备内战的阴谋，他在美国的大力支持下，加紧部署全面内战。1946年6月26日，国民党军队30万人进攻中原解放区，全面内战爆发。蒋介石扬言，要在三五个

月起，蒋介石改为重点进攻山东、陕北两个解放区。但仅仅两个月，人民军队就改变了战场的局势。

在国民党军溃败的同时，5月，反饥饿、反内战运动在全国兴起，蒋介石政府内外交困。5月30日，毛泽东发表评论指出：“和全民为敌的蒋介石政府，现在已经发现它自己处在全民的包围中。”

淮海战役打响后，1948年11月14日，毛泽东发表评论，认为战争进程将大为缩短，原来预计从1946年7月起，大约需要5年左右时间。现在看来，“只需从现时起，再有一年左右的时间，就可能将国民党反动政府从根本上打倒了”。

戳穿国民党假和谈计

在各方面的压力下，蒋介石被迫于1949年元旦发表“求和”的《新年文告》。1月4日，毛泽东写了题为《评战犯求和》的评论，揭露这个“求和”本质上是为了保存中国反动势力和美国在华侵略势力，争取喘息时间，以便卷土重来。

为了早日结束战争，减少人民的痛苦，毛泽东仍愿和谈。但国民党却毫无诚意，蒋介石“下野”后，“代总统”李宗仁口头表示愿意和谈，心里盘算的仍是“划江而治”。

为了进一步戳穿国民党的诡计，毛泽东连续发表评论，指出国民党死硬派所谓“政府与其无条件投降，不如作战到底”之类的叫嚷，暴露了这些人之前口口声声“以拯救人民为前提”的虚伪。

4月13日，国共代表在北平举行谈判。但双方和谈的成果，却在4月20日被国民党政府拒绝了。4月21日，毛泽东、朱德发出《向全国进军的命令》。4月23日，解放军占领南京，国民党反动统治宣告覆灭。

(摘自《党史博览》)

1936年12月，毛泽东填了一首《临江仙·给丁玲同志》，其中“纤笔一枝谁与似？三千毛瑟精兵”一句，表达了毛泽东对“笔杆子”和“枪杆子”辩证关系的认识。本文选取了解放战争关键时刻，毛泽东撰写的一些批驳蒋介石的评论，管窥他是怎样用“文房四宝”打败国民党的。

揭露蒋介石搞独裁打内战

进入1945年，蒋介石和国民党一心抢夺抗战胜利果实，以维持独裁统治。国民党为了欺骗舆论，提出7月7日在重庆召开第四届国民参政会，为召集所谓的“国民大会”做准备。

对蒋介石的伎俩，毛泽东看得很清楚，中共决定不参加。7月10日，毛泽东为新华社写了题为《赫尔利和蒋介石的双簧已经破产》的评论，指出参政会有近一半人员未出席，中共方面无人出席，原因在于这次会议与成立联合政府相背离，完全“以粉饰蒋介石独裁统治为目的”。蒋介石这么做，与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的怂恿和撑腰密不可分。

仅过两天，毛泽东又写了题为《评赫尔利政策的危险》的评论，指出赫尔利式的政策“助长了国民党政府的反动，增大了中国内战的危机”。

为了垄断受降权利，8月11日，蒋介石以最高统帅的名义给八路军发出命令：“所有该集团军所属部队，应就地驻防待命。”同时，蒋介石打着受降的幌子，调运大军向解放区进逼。

8月13日，毛泽东写了题为《蒋介石在挑动内战》的评论，指出蒋介石的目的是“在当着国内外集中注意力于日本无条件投降之际，找一个借口，好在抗战结束时，马上转入内战”。

蒋介石在国内外反内战的强大政治压力之下，不得不装出和平姿态，邀请毛泽东到重庆进行和平谈判。

指出蒋介石日落途穷的命运

8月28日，毛泽东一行前往重庆，进行谈判，

古人这些套路助你笑傲职场

对于现代人来说，职场就是江湖，自然少不了恩怨情仇。当我们在职场遇到了困惑怎么办？自然是去找古人要答案。

陈子昂敢请上身

在第二次落榜后，陈子昂有点苦闷，于是一个人上街逛逛，见一人在卖胡琴，标价百万，很多富豪权贵都在一旁只围观不出钱。陈子昂变身霸道总裁道：“我出一千贯（一千贯），马上给我包起来。”现场瞬间就沸腾了！

现场有人问：“您为什么要花重金买下这把胡琴呢？”陈子昂非常淡定：“我的琴艺过于高超，目前也就这把胡琴能够配得上我。如果大家想进一步了解，明天宣阳里见。”

第二天，长安城里的富豪权贵以及好事者都聚集于宣阳里。陈子昂不弹奏胡琴，却神色激昂地说道：我陈子昂创作数百篇诗文无人知晓，这胡琴不过是个乐器，怎能与我的诗文相提并论？

说罢，陈子昂就将胡琴当众砸烂，同时分发自己的诗文。此后，陈子昂成了京城著名诗人，不久就中了进士，官至右拾遗。

这一切看似是愤青的行为艺术，实是一场成功的自我营销。胡琴虽然昂贵，但也击中了陈子昂的目标群体，使陈子昂的诗歌得以传播。

卢怀慎扮猪吃虎

唐玄宗时，卢怀慎与姚崇作为左右宰相，是竞争对手。姚崇性格强势，雷厉风行，但有些心高气傲。只要是看着他看不顺眼的人，要么挤走，要么搞垮。

对于姚崇的强势，卢怀慎直接“示弱”，只要是出风头、显政绩的活儿，都推给姚崇，并且满怀谦卑地说：“我就在您后边，扫扫尾。”姚崇如果提出什么规划政策，只要没有大问题，卢怀慎就不再提任何意见，帮着姚崇一起完成，并且查漏补缺。久而久之，姚崇不觉得这位同僚有什么威胁，更像是自己的一个得力助手，自然也就没有想排挤走卢怀慎。

某次姚崇休长假，卢怀慎值班，朝廷上下以为这下他会趁机有所行动。但卢怀慎只处理了鸡毛蒜皮的日常事务，说重大的事一律等姚崇回来再处理。于是，卢怀慎获得了“伴食宰相”的称号，这个诨号被人用来讥讽碌碌无为的官员。

对此卢怀慎很淡定，只做好分内的事，并且长久地保持自己廉洁公正的官声，日子过得十分清贫。卢怀慎病重期间，还给玄宗上表，推荐宋璟、李洁、卢从愿、李朝隐等人。

卢怀慎为官一生，或许很多人不给他不值，但他才是职场上有大格局、大智慧的人。他从不与同僚为敌，而是将对手变队友，自己站稳了位置，也换来了“双赢”共同发展，所以才有了“开元之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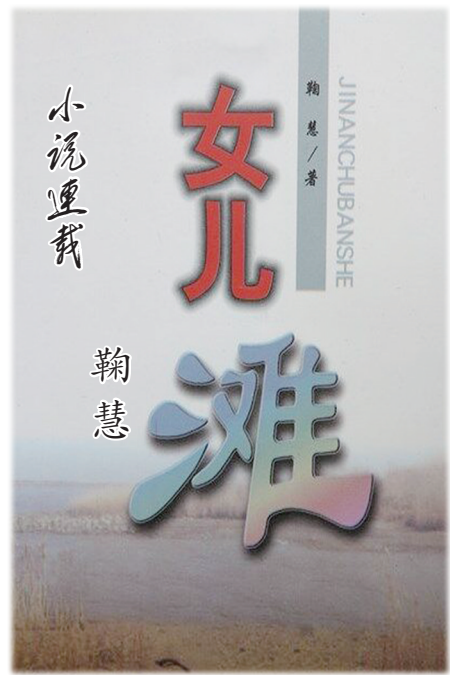
褚遂良向上管理

褚遂良本是降臣，起初在唐朝日子并不好过，后来成为唐太宗的起居郎。起居郎需要记录皇帝的一言一行，褚遂良就练就一手好书法；李世民要征高丽，褚遂良就分析利弊，劝阻李世民；李世民非要出征，褚遂良就全力配合……

李治被立太子后，宫里频频出现野山鸡，唐太宗就不淡定了：莫非这是异兆？褚遂良站出来：“秦文公时，有童子化为野山鸡，雌者鸣于陈仓，雄者鸣于南阳。那个童子说过，得雄者王，得雌者霸。秦文公得到雌鸡称霸，刘秀得到雄鸡称皇。陛下，您曾经是秦王，所以雌雄都在秦地出现，此乃大吉，也说明你非常英明！”

几句话就让唐太宗心安，于是赞赏褚遂良：“立身之道，莫先于学，遂良博识，深可重也。”这几句赞赏，算是说到了点子上，职场上懂得向上管理，要情商高，于是就出现了很多低级的“高情商”：整天围着领导转悠，公私不分地伺候着领导，好话说得不着边际，这不叫情商高，叫奴才。只有有足够强的能力与多项技能，“会来事”“能干活”，才能在职场上无可替代。

(摘自《北京青年报》)



每顿饭，芳草都想千方百计地粗粮细做，以求日渐消瘦的全福能多吃点。身体好些了，情绪或者会好起来的，芳草期盼着。可每顿饭，全福却总是对着桌上的饭菜唉声叹气，没有酒，他简直就吃不进饭去。

他的饭量大减了，可是脾气却是一天比一天大起来，动不动就瞪起眼睛来骂骂咧咧摔摔打打的，一副看啥都不顺眼的样子。开始的时候，芳草也偷偷流了不少泪。后来，对全福的吵闹，她已不再介意。一切，由他去吧，她想，满腹的无奈。

也许，有点事做，他会好些吧。

这天晚上，芳草便平心静气地跟全福谈起了自己的想法。

“地里的活你也干不惯。你看俺嫂子，有集的时候摆个小摊，一天也挣个三十、五十的。不如借点钱，你也摆一个摊。你以前干过这个，横竖总比摆桌子要强。你老是一个人在家闷着，也不好，镇上的人你也熟，你说呢？”

“哼，嫌我在家不干活是不是，明天我就下地给你干去！你别没事找事，净让我干那丢人现眼的事。”

芳草懵了，不知道哪句话又伤了他。

“我这不是在跟你商量吗？你真不愿干，我也

内消灭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

毛泽东对战争形势进行了科学分析，提出“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著名论断。正如毛泽东所料，党领导解放区军民沉着应战，8个月歼敌71万余人，挫败了国民党军的全面进攻。1947



在钱学森逝世十周年之际，钱学森之子钱永刚在上海交通大学钱学森图书馆接受了专访，讲述了父亲钱学森归国故事。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身在美国的钱学森得知这一消息后，开始筹划回国。当时，钱学森是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喷气推进中心主任，在美国享受着优厚的科研条件。为了回国，钱学森先后辞去在美国的一切职务，脱离美国军方身份。但美国军方并不想放钱学森回国。美国海军部副部长丹尼尔·金贝尔甚至威胁说：“一个钱学森抵得上5个海军陆战队。我宁可把这个家伙枪毙了，也不能放他回中国去！”

1950年9月7日，钱学森被美国司法部移民归化局非法拘留，关押在洛杉矶以南特米诺岛的拘留所里。钱学森夫人蒋英（生前采访）：强大的探照灯24小时对准他，不让他获得休息。每隔十分钟就有一个士兵打开沉重的铁门，伸进头来看看他有没有逃跑。大铁门很重，声音很响很刺耳。被拘禁15天后，加州理工学院院长和钱学森的导师等人凑齐了一万五千元美金，将钱学森保释出狱。回家后，蒋英发现，钱学森不仅在这15天掉了十五公斤，而且还失声了。经过休养，钱学森的失声得到康复，但他不能从事自己之前的研究，还必须每月向洛杉矶移民局汇报行程。1955年6月，钱学森被软禁的第五个年头，他甩掉美国方面的监视，将一封写给当时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陈叔通的信，辗转寄回祖国。信中说自己“无一日、一时、一刻不思归国参加伟大的建设高潮”。1955年8月5日，在中国政府的交涉下，钱学森终于收到了美国司法部移民归化局的信件，被告知可以离开美国。1955年9月17日是钱学森和蒋英结婚8周年纪念日，这一天，钱学森和蒋英带着一双儿女

返回祖国。

从美国洛杉矶到中国香港，一万多公里，二十多天的航程。启程回国前，钱学森收到了一封父亲钱均夫发来的电报，电报内容很简单：沿途切勿下岸。为了安全起见，钱学森照做了。当回到上海，蒋英向钱均夫询问这封电报的时候，钱均夫却回答：我没发过。

这封电报究竟是谁发的？成了一个谜。

50年后，外交部解密了部分档案，其中就包括这封电报的底稿。原来，这是外交部担心钱学森的安全，害怕他归国路上发生意外，特意以父亲的名义叮嘱他留在船上，不要上岸。钱学森刚把这份电报底稿复印下来带回家。埋藏在钱学森一家心里的谜，终于解开。

1955年10月，钱学森一家回到祖国。仅仅一个月后，钱学森就深入东北地区的有关厂矿、大学和研究所考察调研。在访问哈军工时，院长陈赓大将从北京飞抵哈尔滨，与钱学森商谈研制导弹事宜。钱学森（生前采访）：他就问我，中国人搞导弹行不行？我那个时候正憋着一肚子气，中国人怎么不行？所以回答很干脆，我说外国人能搞的难道中国人不能搞？中国人比他们矮一截？陈赓大将听了以后非常高兴，说好极了，就要你这句话。

(摘自《武汉晚报》)

返回祖国。

从美国洛杉矶到中国香港，一万多公里，二十多天的航程。启程回国前，钱学森收到了一封父亲钱均夫发来的电报，电报内容很简单：沿途切勿下岸。为了安全起见，钱学森照做了。当回到上海，蒋英向钱均夫询问这封电报的时候，钱均夫却回答：我没发过。

这封电报究竟是谁发的？成了一个谜。

50年后，外交部解密了部分档案，其中就包括这封电报的底稿。原来，这是外交部担心钱学森的安全，害怕他归国路上发生意外，特意以父亲的名义叮嘱他留在船上，不要上岸。钱学森刚把这份电报底稿复印下来带回家。埋藏在钱学森一家心里的谜，终于解开。

1955年10月，钱学森一家回到祖国。仅仅一个月后，钱学森就深入东北地区的有关厂矿、大学和研究所考察调研。在访问哈军工时，院长陈赓大将从北京飞抵哈尔滨，与钱学森商谈研制导弹事宜。钱学森（生前采访）：他就问我，中国人搞导弹行不行？我那个时候正憋着一肚子气，中国人怎么不行？所以回答很干脆，我说外国人能搞的难道中国人不能搞？中国人比他们矮一截？陈赓大将听了以后非常高兴，说好极了，就要你这句话。

1956年2月，钱学森起草了《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意见书》，为我国火箭和导弹技术的创建与发展提供了极为重要的实施方案。1956年10月8日，是钱学森回国到祖国一周年的日子。这一天，由钱学森受命组建的我国第一个火箭、导弹研究机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成立。十年之后，1966年10月，两弹试验结合成功。从此，中国的核导弹终于具备了威慑与实战能力。

(摘自《武汉晚报》)

钱学森归国前 曾收到神秘电报

10月22日，日本德仁天皇举行即位大礼，正式登基成为新天皇。伴随着一系列仪式和典礼的，还有一道“恩赦令”，55万人因此得以减免处罚。日本社会对此争议不断，不少网民表示，“都现代社会了，还搞什么大赦天下。”不过相比30年前明仁天皇即位后的恩赦，如今这一切算是“小巫见大巫”。

根据日本学者的考证，日本的恩赦至迟在公元八世纪的奈良时代即已出现。1889年，明治维新后的日本颁布了其历史上首部宪法，即《大日本帝国宪法》。其中规定，只有天皇有下达恩赦令的权力。从此时起至1945年日本战败为止，根据这部宪法，日本一共实行了六次较大规模的恩赦和数十次小规模恩赦。

1945年日本战败后，《大日本帝国宪法》随之被废除。当年10月，日本政府对战前和战中被关闭的一些犯人实施了战后首次恩赦。1946年11月，新的日本宪法颁布，规定恩赦的实施由内阁决定，再经天皇确认。自1946年11月至今，日本又一共实行了14次恩赦。这些恩赦涉及人数超过4500万，但引起的争议颇多。例如1952年日本实行的恩赦释放了5000多名囚犯。但随后有法务省相关人士透露：“这些人出狱之后由于找不到工作，又居无定所，不少人又在出狱一年后因为犯罪而再一次被判入狱。”与一般人想象中的“大赦天下”不同，日本的恩赦不是简单地对所有犯罪都一视同仁地减刑或释放，它包括大赦、特赦、减刑、免刑、复权五大类。其中最具有日本特色的赦免方式是复权，指的是恢复因违法而被剥夺的某些权利或资格。在日本战后的几次较大规模恩赦中，复权是被使用最多的恩赦类型。例如1989年昭和天皇去世时实施的特大恩赦涉及1000多万人，实际上真正因犯罪而被大赦和特赦的只有不到3万人，其余的大都是复权。

由于涉及的人数太多，1989年的这次恩赦还在日本社会引发一场不小的风波。当时有超过1.5万名因为违反公职选举法而被剥夺了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政治活动人员，由于这次的复权而恢复了自己的政治权利，对次年的参议院议员选举造成冲击。因此当时日本《朝日新闻》批评此次恩赦根本是对违反公职选举法的人员进行的“救济”，不过是在满足自民党的要求而已。

如此大规模的“恩赦”，想趁机钻空子的人也不在少数。1984年“夕张保险金杀人事件”的主犯日高安政、日高信子夫妻就是典型例子。当时这对夫妻为骗取保险金，指使一名手下在自家公司的工人宿舍里放火并伪装成意外失火，导致包括两名儿童、一名消防员在内的六人死亡，骗取了高达一亿多日元的保险金后因两人未兑现承诺给手下的分红，被手下告发，锒铛入狱。1987年，札幌地方法院判处日高夫妻死刑。这对夫妻随即上诉，但过了不久，他们却又令人意外地撤回上诉请求。

原来，这对夫妻在狱中得到消息，昭和天皇已经病重，按日本的传统，天皇去世时会实施“大赦”，这样他们就有可能借大赦来获得减刑，如此一来自然没有必要上诉了。但他们打错了算盘。1989年2月8日颁布的恩赦实施标准中，恩赦适用范围并不包括被判处死刑的犯人。1996年，眼看赦免无望的这对夫妻竟然又向札幌高等法院和日本最高法院提起申诉，以“对恩赦理解有误”为由，希望获得上诉权，但被驳回。1997年8月1日，日高夫妇在札幌刑务所内被先后执行死刑。这是战后日本首次处死一对夫妇。

1990年，明仁天皇正式即位，再次实施恩赦，涉及250万人，其中获得特赦、减刑、免刑的不过区区300多人，其余全部都是复权。在这次复权中，又有约5000名因违反公职选举法被剥夺权利的人员恢复了自身的权利。由此也再次引来了《朝日新闻》《日经新闻》等日本媒体对“政治恩赦”的抨击。正是因为考虑到之前大规模恩赦引发的社会争议，日本政府对新天皇登基的“恩赦令”相当谨慎，涉及的人数也大幅削减。即便如此，民调显示日本民众支持恩赦的比例为24.8%，而不支持的高达60.2%。虽然此次恩赦对象限定在“轻微犯罪”，但很多民众依然认为“惩罚罪犯理所当然，赦免他们很莫名其妙。”

(摘自《环球时报》)

糊弄了？唉，人生能有几回醉啊！”“是啊，郑哥，还是你想得开……”

他们还说了些什么，芳草已经听不见了。她只觉得大脑嗡嗡地响个不停，一双眼睛呼呼地往外冒着金星，跌跌撞撞地，她离开了那家饭店的大门。

上当受骗的感觉，一下浸透了芳草的五脏六腑。芳草回到家，呆坐在椅子上，欲哭无泪。

思来想去，芳草决定找全福好好谈谈。当她把全福一趟趟到镇上的事摆出来时，全福先是愣了一下，接着，他一下跳起来说：“你以为贷款是那么好办的？你有本事，也到镇上跑两趟试试。”

“贷款是不好办，可你不该骗我！”芳草声音不高却一字一句地对住全福。

“你能耐，也办个公司出来让我瞧瞧嘛！站着说话不嫌腰疼，你以为是比你比我强多少！”全福的话，一块块石头般砸在芳草的心上。她的心，在滴着血。为了他，我放弃了考试，放弃了学习机会，可到头来又怎样？

哼，不定哪一天，我还真要办出个公司来让你郑全福瞧瞧！芳草在心中发起狠来。

不知为什么，东海的影子，又在她的脑海中闪了一下，然后定格在她的眼前。

(八十八)